恩格斯论哥达纲领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21]

茨威考

1875年3月18—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已经接到您2月23日的来信，并且为您身体这样健康而高兴。

您问我，我们对合并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可惜我们的处境和您完全一样。无论是李卜克内西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给我们一点消息，因此，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报纸上所登载的那些，而直到大约八天前收到纲领草案时为止，报纸上并没有登载什么。这个草案的确使我们吃惊不小。

我们党经常地向拉萨尔派伸出手来，建议和解或者至少是共同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哈森克莱维尔们、哈赛尔曼们和特耳克们的无礼拒绝，因而就连每个小孩都必然要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这些先生们现在自己来谋求和解，那他们一定是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但是，考虑到这些人的尽人皆知的本性，我们就有责任利用这种困境取得一切可能的保证，使这些人不能利用我们的党在工人舆论中重新巩固他们已经动摇的地位。我们应当以极其冷淡的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他们，能否达到合并，这取决于他们有

多少诚意放弃他们的宗派口号和他们的“国家帮助”，并基本上接受1869年的爱森纳赫纲领[22]或这个纲领的和目前情况相适应的修正版。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学习**的，而拉萨尔派倒是应当向我们的党学习；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也就是说他们首先即使不完全放弃国家帮助这剂救世灵药，也要承认它同其他许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样是个附属的过渡措施。纲领草案证明，我们的人在理论方面比拉萨尔派的领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诚实的人”[19]又一次受到了不诚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骗。

第一，接受了拉萨尔的响亮的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错误的说法：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都只是反动的一帮。这句话只有在个别的例外场合才是正确的，例如，在象巴黎公社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或者是在一个不仅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建立了国家和社会，而且继它之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也已经彻底完成了这种改造的国家里。拿德国来说，如果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属于这反动的一帮，那末，社会民主工党怎么能同他们，同人民党[6]携手合作了这么多年呢？《人民国家报》[23]怎么能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法兰克福报》[24]中吸取自己的几乎全部的政治内容呢？怎么能在这个纲领中列入了整整七项简直逐字逐句同人民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相符合的要求呢？我所指的是七项政治要求，即1到5和1到2，这七项要求中没

有一项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25]。

第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在目前实际上已经完全被抛弃，而且是被五年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一直极其光荣地实行这一原则的人们所抛弃。德国工人之所以处于欧洲运动的先导地位，**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战争期间采取了真正国际主义的态度；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能做得这样好。现在，在国外，当各国政府极力镇压在某一个组织内实现这一原则的任何企图而各国工人到处都强调这个原则的时候，他们却打算抛弃这个原则！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只剩下渺茫的希望——甚至不是对欧洲工人在今后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进行共同合作的希望，不是的，而是对未来的“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的希望，是对和平同盟[26]中的资产者的“欧洲联邦”的希望！

当然根本没有必要谈国际本身。但是，至少不应当比1869年的纲领后退一步，而大体上应当这样说：**虽然**德国工人党**首先**是在它所处的国境之内进行活动（它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别是没有权利讲错误的话），但是它意识到自己和各国工人的团结一致，并且经常准备着，象过去一样地继续履行由这种团结一致所带来的义务。即使不直接宣布或者认为自己是国际的一部分，这种义务也是存在着的，例如，在罢工时进行援助并阻止工贼活动，设法使德国工人通过党的机关报刊了解国外的运动的情况，进行反对日益迫近的或正在爆发的王朝战争的宣传，在这种战争期间实行1870年至1871年所模范地实行过的策略

等等。

第三，我们的人已经让别人把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16]强加在自己头上，这个规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而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工人总是太多了（这就是拉萨尔的论据）。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已经详细地证明，调节工资的各种规律是非常复杂的，随着情况的不同，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象拉萨尔所想象的那样用三言两语来了结。拉萨尔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歪曲了后者）那里抄袭来的这一规律的马尔萨斯式的论据，例如拉萨尔在《工人读本》第5页[27]上引自他的另一本小册子的这一论据，已被马克思在《资本的积累过程》[28]一篇中驳斥得体无完肤了。接受拉萨尔的“铁的规律”，那也就是承认一个错误的论点和它的一个错误的论据。

第四，纲领把拉萨尔从毕舍那里剽窃来的国家帮助原封不动地提出来作为**唯一的社会的**要求。而这是在白拉克非常出色地揭露[29]出这个要求毫无用处之后，在我们党的几乎所有的、甚至全部的发言者在同拉萨尔分子的斗争中不得不起来反对这种“国家帮助”之后提出来的！我们党是不能比这更自卑自贱了。国际主义竟降低到阿曼特·戈克的水平，社会主义竟降低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毕舍的水平，而毕舍提出这个要求来**对付社会主义者**，是为了夺取他

们的阵地!

拉萨尔的“国家帮助”至多也只是为达到目的而实行的许多措施中的**一个**，而纲领草案却用软弱无力的词句表述这个目的:“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好象我们还有一个在理论上**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似的！所以,如果说:“德国工人党力图通过工业和农业中的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合作生产来消灭雇佣劳动并从而消灭阶级差别；它拥护每一项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措施!”——那是没有一个拉萨尔分子能提出什么反驳来的。

第五，根本就没有谈到通过工会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它靠这种组织和资本进行经常的斗争,使自己受到训练,就是最残酷的反动势力(象目前在巴黎那样）现在也决不可能摧毁这种组织。既然这一组织在德国也获得了这种重要性,我们认为,在纲领里提到这种组织，并且尽可能在党的组织中给它一个位置，那是绝对必要的。

这就是我们的人为了讨好拉萨尔派而作出的一切。而对方做了些什么让步呢？那就是在纲领中列入一堆相当混乱的**纯民主主义的要求**,其中有一些是纯粹的时髦货,例如“人民立法”,这种制度存在于瑞士,如果它还能带来点什么东西的话,那末带来的害处要比好处更多。要是改成“由人民来**管理**”,这还有点意义。同样没有提出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

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至于在任何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中都会列入而在这里看起来有些奇怪的要求，如科学自由、信仰自由，我就不想再说下去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30]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Gemeinwesen》〔“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

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也是很成问题的。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

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看法，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经是正确的，但是，象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

我不再写下去了，虽然在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它是这样一种纲领，如果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而且我们一定会非常严肃地考虑，我们将对它采取（而且也要公开采取）什么态度。请您想想，在国外人们是要**我们**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言行负责的。例如，巴枯宁在他的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要我们替《民主周报》创办以来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和所写的一切不加思考的话负责[31]。在人们的想象中，我们是在这里指挥一切，可是您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对党的内部事务进行过任何干涉，如果说干涉过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为了尽可能改正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地方，而且的确是**仅仅限于理论上的**。但是您自己可以理解，这个纲领形成一个转折点，它会很容易地迫使我们拒绝替承认这个纲领的政党承担任何责任。

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因此，新的纲领无论如何不应当象这个草案那样比爱森纳赫纲领还倒退一

步。总还得想一想，其他国家的工人对这个纲领将会说些什么；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拉萨尔主义的这种投降将会造成什么印象。

同时我深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连一年也保持不了。难道我们党的优秀分子会愿意不断地重复拉萨尔关于铁的工资规律和国家帮助那一套背熟了的词句吗？我想看看譬如您在这种情况下的态度！而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听众就会向他们喝倒采。而且我相信，拉萨尔派会死抱住纲领的**这些**条文不放，就象犹太人夏洛克非要他那一磅肉[1]不可一样。分裂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到那时我们已经恢复哈赛尔曼、哈森克莱维尔和特耳克及其同伙的“诚实的”名声；分裂以后，我们将被削弱，而拉萨尔派将会增强；我们的党将丧失它的政治纯洁性，并且再也不可能奋不顾身地起来反对它自己在一个时期内写在自己旗帜上的拉萨尔词句；如果拉萨尔派以后又说：他们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工人党，我们的人是资产者，那末，他们是可以拿这个纲领来证明的。纲领中的一切社会主义措施都是**他们的**，而**我们的**党除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些要求就什么东西也没有添进去，**这个党**在同一个纲领中又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成“反动的一帮”中的一部分！

我把这封信搁下来，是因为您在4月1日庆祝俾斯麦生辰那一天才会被释放，而我是不愿意让这封信去冒以走私方式传送时被搜去的危险的。刚刚接到了白拉克的信，

①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三场。——译者注

他对这个纲领也有很大的疑虑，他想了解一下我们的意见。因此，为了迅速起见我把这封信寄给了他，让他看一下，而我也就用不着把这个麻烦东西再全部重写一遍。此外，我同样直率地告诉了朗姆，我给李卜克内西只是简单地写了几句。我不能原谅他，因为关于全部事件直到可以说太迟的时候他还连**一个字**也没有告诉我们（而朗姆和其他人却以为他已经详细地通知我们了）。他从来就是这样做的——因此，我们，马克思和我，同他进行了许多次不愉快的通信——，但是，这一次做得实在太可恶了，**我们坚决不和他一起走**。

希望您设法夏天到这里来，当然您将住在我这里，如果天气好，我们可以去洗几天海水浴，这对于过了很久牢狱生活的您一定会有很大的好处。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

马克思刚刚搬了家。他的住址是：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月牙街41号。

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

不伦瑞克

1875年10月11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白拉克：

我对您最近一些来信（最后一封是6月28日）回答迟了，第一是因为马克思和我有六个星期不在一起，他在卡尔斯巴德，我在海边，我在那里看不到《人民国家报》[23]，第二是因为我想稍微等一下，看看新的合并和联合委员会[32]的实际情况如何。

我们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李卜克内西热衷于实行合并，为了合并不惜**任何**代价，结果把事情全搞糟了。本来可以认为这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当向对方说出来或表示出来。可是在那样搞了以后就得永远拿一个错误为另一个错误辩护。既然合并代表大会已经在腐朽的基础上召开了并且也四处宣扬了，他们就无论如何不愿意让它失败，从而不得不在本质问题上再次作出让步。您说的完全对：这种合并本身包含着分裂的萌芽。如果以后垮掉的**只是**不可救药的狂热分子，而不是他们的所有拥护者，我将感到高兴，因为这些拥护者本来很干练，他们在良好教育下是可以成为有

用的人的。这要取决于这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的时间和条件。

这个经过最后修改的纲领包括下面三个组成部分：

1. 拉萨尔的词句和口号，这些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应接受。如果两个派别实行合并，那末写入纲领的应该是双方一致同意的东西，而不是有争论的东西。然而我们的人竟容许了这些，甘心情愿地通过了卡夫丁轭形门[33]；

2. 一系列庸俗民主主义的要求，这些要求是按照人民党的精神和风格拟出的；

3. 一些多半是从《宣言》中抄来的本应是共产主义的命题，但是作了这样的修改，只要仔细一看，全都是些令人毛骨耸然的谬论。如果不懂得这些事物，那就不要触动它们，或者把它们从那些懂得这些事物的人那里逐句地抄下来。

幸而这个纲领的遭遇比它应该有的遭遇要好些。工人、资产者和小资产者在其中领会出它本来应该有但现在却没有的东西，任何一方面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想到去公开分析这些奇怪的命题中任何一个命题的真实内容。这就使我们可以对这个纲领保持沉默。同时，这些条文不能译成任何一种外文，除非**硬**写成明显的胡言乱语，或者是给它们掺进共产主义的含义，而后者是朋友和敌人都会做的。我自己在为我们的西班牙朋友翻译这个纲领时就不得不这样做。

就我所看到的委员会的活动来说，不是令人欣慰的。第一，攻击您的和伯·贝克尔的著作的事件[34]；如果它没有

实现，这与委员会无关。第二，宗内曼（马克思在旅途中曾遇到他）说，他曾建议瓦耳泰希为《法兰克福报》[24] 撰稿，但是委员会**禁止**瓦耳泰希接受这个建议！这比书报检查制度还要厉害，我不明白瓦耳泰希怎么能容忍这种禁令。真蠢！他们倒是应该设法使得《法兰克福报》在德国各地都有我们的人为它服务！最后，拉萨尔派的成员在建立柏林联合印刷所的行动，在我看来也不是很有诚意的：我们的人在莱比锡印刷所轻信地赋予了该委员会以监察委员会的职能，而柏林人却要在**强迫**之下才这样做。不过，我对这方面的详情不十分了解。

委员会的活动很少，而且正象这几天曾在这里的卡·希尔施所说的，它只是作为通讯机关和问讯机关混日子，这倒也好。委员会的任何积极的干预只会加速危机的到来，看来人们也感到了这一点。

同意在委员会中有三个拉萨尔分子，而只有两个是我们的人，这是何等的软弱！

总之，我们看来受了一点损失，虽然损失还是相当重的。我们希望，事情不再发展下去，同时希望，在拉萨尔派中间的宣传能起到作用。如果到下届帝国国会选举[35] 以前情况不变，事情就会好转。不过，施梯伯和特森多尔夫① 将全力以赴地进行活动，到那时候就会看清哈赛尔曼和哈森克莱维尔是些**什么东西**。

---

① 施梯伯是普鲁士政治警察头目；特森多尔夫是普鲁士国家检察官。——译者注

马克思从卡尔斯巴德回来了，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更加壮实、容光焕发、精神饱满、身体健康，很快就能够重新全力投入工作。他和我衷心问候您。有便时，请告诉我们这件事后来的发展情况。莱比锡人[36]同这件事有很深的关系，所以不向我们说明真相，而党的**内部**事情正是现在更加不公开了。

忠实于您的　**弗·恩·**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75年10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您的来信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看法：这种合并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是太轻率了，而且它本身就包含着将来分裂的萌芽。如果这种分裂能推迟到下届帝国国会选举[35]以后，那就很好了……

现在这个形式的纲领包括三个部分：

1. 拉萨尔的词句和口号，接受这些东西是我们党的一种耻辱。如果两派要想就共同的纲领达成协议，那就应当在纲领中采纳双方一致同意的东西，而不涉及双方不一致的地方。诚然，拉萨尔的国家帮助也曾列入爱森纳赫纲领，但是，在那里它不过是许多**过渡措施**中的**一个**，而且就我所听到的一切来看，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要不是**合并，它就会在今年的代表大会上根据白拉克的提案删掉了。现在它却被看做医治一切社会病症的绝对正确的和唯一的良药。让别人把“铁的工资规律”[16]和拉萨尔的其他词句强加在自己头上，这是我们党在道义上的一次巨大失败。我们的党改信拉萨尔的信条了。这是怎么也否认不了的。纲领的这

一部分是卡夫丁轭形门[33],我们党就从这下面爬向神圣拉萨尔的赫赫声名;

2. 民主要求，这些要求完全是按照人民党的精神和风格拟出的;

3. 向“**现代**国家”提出的要求（而且不知道其余的“要求”应当向谁提!），这些要求是非常混乱和不合逻辑的;

4. 一般的原理，多半是从《共产党宣言》和国际的章程中抄来的，但是修改得不是把内容**全部弄错**，就是变成了**纯粹的谬论**，正如马克思在您熟知的那篇文章① 中所详细指出的那样。

整个纲领都是杂乱无章、毫无联系、不合逻辑和丢丑的。要是资产阶级新闻界中有一个有批判头脑的人，他就会把这个纲领加以逐句研究，弄清每句话的真实含义，极其明确地指出荒诞无稽的地方，揭露出矛盾和经济学上的错误（例如，其中断言：劳动资料今天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似乎地主已经不存在了；不说工人阶级的解放，而胡说“**劳动**的解放”，而劳动本身在今天恰恰是**过分自由了**!），从而把我们的整个党弄得非常可笑。资产阶级新闻界的蠢驴们没有这样做，反而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纲领，领会出其中所没有的东西，并做了共产主义的解释。工人们似乎也是这样做的。**仅仅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我才没有公开声明不同意这个纲领。当我们的敌人和工人都把我们的见解掺到这个纲领中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对这个纲领

① 指《哥达纲领批判》。——译者注

保持沉默。

如果您对人选问题上所达到的结果感到满意，那就是说，我们这方面的要求一定已降得相当低了。两个是我们的人，三个是拉萨尔派！因此，在这里，我们的人也不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同盟者，而是战败者，并且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要处于少数地位。委员会的活动，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也不是令人欣慰的：1. 决议**没有**把白拉克的和伯·贝克尔的关于拉萨尔主义的两本著作包括在党的文献目录里；如果说这个决议撤销了，那末这与委员会无关，也与李卜克内西无关；2. 禁止瓦耳泰希接受宗内曼向他提出的担任《法兰克福报》[24] 记者的建议。这是宗内曼亲自告诉路过那里的马克思的。使我感到惊奇的，与其说是委员会的妄自尊大和瓦耳泰希对委员会不是嗤之以鼻而是唯命是从，不如说是这项决议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委员会倒是应该设法使得象《法兰克福报》那样的报纸到处都**只**由我们的人替它服务。

这整个事件是一次富有教育意义的试验，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还有希望取得极其有利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您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的合并只要能维持两年，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但是，它无疑是可以用便宜得多的代价取得的。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斯 图 加 特

1891年1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昨天我**挂号**给你寄去了马克思的手稿①，这份手稿看来会使你感到高兴。在神圣的德意志帝国，我怀疑这份手稿能照**这个样子**发表。请你从这个角度看一遍，把使你担心而又可以删略的地方删掉，用省略号代替。至于从上下文来看不能删略的地方，请你在校样上标出，尽可能用几句话把你担心的**理由**告诉我，我再来酌情处理。凡是要改动的地方，我要加上括弧，并在我的短序中说明：这是**改动过的**地方。因此，请把长条校样寄来！

但是，发表这份手稿，除了警察当局以外，可能还有某些人不赞成。如果你认为不得不考虑这一情况，那就请你把这份手稿**挂号**转寄给阿德勒②。在维也纳那里，大概可以全文刊印（可惜，关于宗教需要的精彩地方除外），但**无论如何总是会刊印出来的**。不过，我想，在这里告诉你的我

① 指《哥达纲领批判》。——译者注

② 维克托·阿德勒（1852—191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译者注

这个**十分坚定的**意图，会使你完全避免任何非难。既然你们反正不能阻止手稿的发表，那末，在德国本国，就在专门为了刊登这类东西而创办的党的机关刊物《新时代》[37] 上发表，岂不好得多。

为了给你准备这份手稿，我中断了关于布伦坦诺的写作[38]；因为我在这篇关于布伦坦诺的著作中需要利用手稿中关于铁的工资规律[16] 的评述，而且无须费很大气力就可以同时把全部手稿整理出来。我原想在本周内搞完布伦坦诺，但是又来了这么多事，又要处理这么多信，恐怕搞不完了。

如果有什么困难，请通知我。

……

你的　**弗·恩格斯**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1年1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你从随信寄去的校样中可以看出，我不是不近人情的，甚至还在序言中加了几滴使人镇静的吗啡和溴化钾，希望这对我们的朋友狄茨的多愁善感会起一定的抑制作用。今天我就给倍倍尔写信。以前我没有同他谈过这件事，因为我不愿意使他在李卜克内西面前感到为难。那样，倍倍尔就**有责任**把这件事告诉李卜克内西，而李卜克内西——从他在哈雷所做的关于党纲的讲话[39]来看，他已经从手稿中作了一些摘录——会采取一切办法阻挠手稿的发表。

如果“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象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这句话在文中不能保留，那就把加了着重号的几个字删掉，用省略号代替。这样，暗示就会更加微妙，而且仍然十分清楚。可以设想，这样一来，此处就不会引起怀疑。

其他地方，我都按你们的要求做了，而且你看，甚至比你们要求的还**多**。

……

你的　**弗·恩·**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斯 图 加 特

1891年2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你以为，马克思的文章发表以后，给我们的信件会接连不断地飞来吗？恰恰相反，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什么也没有看到。

星期六，我们没有收到《新时代》[37]，我立刻就想到是否又出了什么事情。星期日，爱德① 来到这里，并把你的信给我看了。我以为，禁止发表这篇文章的手法还是得逞了。星期一，《新时代》终于收到了，不久以后，我发现《前进报》[40]也转载了这篇文章。

既然反社会党人法式的行政措施没有奏效[41]，那末这一大胆的步骤就成为这些人所能采取的上策。而且，这一步骤还有一个好处：它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奥古斯特② 由于最初的惊恐所谈到的那个难以逾越的鸿沟。不管怎样，产生这种惊恐，首先是因为担心文章发表后，若是我们的敌人利用了怎么办？此文在正式机关报上转载，会使我们敌人

① 爱德华·伯恩施坦。——译者注

② 奥古斯特·倍倍尔。——译者注

的进攻锋芒减弱，也使我们能够这样讲：请看，我们是怎样自己批评自己的，我们是唯一能够这样做的政党；你们也这样试试看吧！这也正是这些人一开始就应该采取的正确立场。

因此，对你采取某种强制性的措施，也并不那么容易。我曾请你在必要时把手稿寄给阿德勒；一方面这是要对狄茨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也是要为你解脱责任，因为我在一定程度上曾经使你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也给奥古斯特写了信，说明全部责任由我承担。

如果还有什么人负有责任的话，那只有狄茨。他知道，在这类事情上，我对他总是好商量的。我不仅满足了他的全部要求，缓和了他提出的某些地方，甚至还缓和了另外一些地方。如果他标出更多的地方，那也会给予考虑的。但是，狄茨认为无可非议的地方，为什么我不保留下来呢？

其实，惊恐之余，除了李卜克内西，大多数人都会感谢我发表这篇东西。它使未来的纲领免除任何不彻底性和空洞的言词，并且提出了他们① 中间大多数人未必敢于主动提出的无可争辩的论据。人们没有责备他们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间没有修改这个不好的纲领，因为他们当时不能这样做。而现在，他们自己放弃了这个纲领。至于十五年前实行合并时，他们很不高明，竟然受了哈赛尔曼等人的蒙骗，这一点，老实说，他们现在满可以坦率地承认。总之，纲领的三个组成部分：（1）道地的拉萨尔主义，（2）人民党[6]

① 指爱森纳赫派。——译者注

式的庸俗民主主义，（3）谬论，——并没有因为它们作为党的正式纲领保留了十五年之久而变得好些。如果今天还不能公开指出这一点，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要是听到什么新消息，请告诉我们。

多多问候。

你的　**弗·恩·**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斯 图 加 特

1891 年 2 月 11 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你的两封来信已收到，十分感谢。倍倍尔和席佩耳的信现退还。

柏林人还在继续对我进行抵制，我一封信也没有收到，他们显然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然而，《汉堡回声报》[42]发表了一篇社论。如果考虑到这些人还受到拉萨尔主义的强烈影响，甚至还相信既得权利体系[43]，那末，这篇社论写得还是很不错的。我从这篇文章和《法兰克福报》[24]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敌对报刊的攻击即使还没有筋疲力竭，也已经达到了顶点。只要顶住这种冲击，——据我看，直到现在这种冲击是很软弱的——人们就能很快从最初的惊恐中镇静下来。但是，阿德勒的驻柏林记者（阿·布劳恩？）却因为我发表这份手稿竟向我表示感谢。[44]再有两三起这样的反应，反抗就会瓦解。

1875 年 5—6 月间，他们对倍倍尔隐瞒、而且是有意地隐瞒了这份手稿，这在倍倍尔告诉我他的出狱日期是 4 月 1 日时，我马上就清楚了。我还写信对他说，他**应该**看到这

篇文章，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情况”的话。对这个问题，如有必要，我将在适当时候要求对我作出答复。这个文件长期在李卜克内西手里，白拉克费了好大劲才从他那里要了回来。李卜克内西想把这个文件一直保留在自己手里，以便在最后修改纲领时加以利用。至于如何利用，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请把拉法格的文章[45]的手稿按挂号印刷品寄给我，我来处理这个问题。另外，他的关于帕德列夫斯基的文章相当好，对于驳斥《前进报》[40]对法国政治的失实报道是很有用的武器。总之，威廉①在这方面很不走运。**他**到处吹捧法兰西共和国，而他自己的特约记者盖得却到处骂法兰西共和国。[46]

据席佩耳说，党团准备发表一项声明[47]，对此我根本不予理睬。如果他们愿意，我准备申明：我没有向他们请示的习惯。至于发表这份手稿他们高兴与否，这跟我毫不相干。我乐意为他们保留就这个或那个问题表示异议的权利。如果情况不致发展到我非对声明表态不可，我是不会想去答复的。我们就等着看吧。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不准备给倍倍尔写信，因为，第一，他本人应该先告诉我，他对这个问题的最后意见是怎样的；第二，党团的每一项决议都是全体成员签名的，不管表决时是否每个成员都表示赞成。不过，如果倍倍尔以为我会让自己卷入一场不愉快的论战，那他就错了。要我卷入这场

① 威廉·李卜克内西。——译者注

论战，首先他们要说一些我不能置之不理的谎言等等。相反地，我简直是满怀和意，也没有任何理由发火，我渴望架设任何一种桥梁——浮桥，机架桥，铁桥或石桥，甚至是金桥，以便跨越倍倍尔隐约看到在远处可能存在的深渊或鸿沟。

真奇怪！现在席佩耳写道，许多老拉萨尔分子以自己的拉萨尔主义感到自豪，而他们在这里时[48]，却异口同声地断言：在德国再没有拉萨尔分子了！这种说法正是使我打消某些疑虑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现在倍倍尔也认为，许多好同志受到很大挫伤。这样的话，本来就应该把当时的情况如实地告诉我。

其次，如果在十五年后的今天，还不能直截了当地谈论拉萨尔在理论上的胡诌和妄测，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然而，当时由于反社会党人法[41]的存在，党本身及其执行委员会、党团以及其他等等，除了因为通过这样一个纲领而受到谴责（而这是无法逃避的）外，没有受到任何其他谴责。在这项法令实施期间，根本谈不上修改纲领的问题。而法令一废除，修改纲领的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这样，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另外，还要使人们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做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

你的　**弗·恩·**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1年2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1月16日的来信收到了。

……

在《新时代》[37]上发表的马克思的文章，你已经读过了。这篇文章起初使德国社会党的统治者大为恼火，现在看来开始逐渐平静下来。相反地，在党内——老拉萨尔分子除外——这篇文章却很受欢迎。维也纳《工人报》[49]（你将在下一邮班收到）驻柏林记者竟感谢我为党做了这件事[44]（据我猜测，是阿道夫·布劳恩，他是维克多·阿德勒的内弟，李卜克内西的《前进报》的助理编辑）。李卜克内西当然要大发雷霆，因为整个批判就是针对他的，而且正是他伙同好男色的哈赛尔曼一起炮制了这个腐朽的纲领。人们最初的惊恐我很理解：这些人以前总是要求“同志们”只能最温和地对待他们，而现在他们竟受到这样无礼的对待，连他们的纲领也被斥为十足的谬论。在整个事件中一直表现得很勇敢的卡尔·考茨基在给我的信中说：党团打算发表一项声明[47]，

说明发表马克思这篇文章事先没有通知他们，他们不赞成发表。这样，就让他们聊以自慰去吧。但是，他们这样做大概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如果党内赞成这篇文章的人日益增多，并且他们认识到，“这会给敌人提供反对我们自身的武器”的叫嚷是没有多大价值的。

在此期间，我受到了这些先生们的抵制，这倒也好，因为可以使我少浪费一些时间。反正这种状况不会继续很久了。

……

你的　**弗·恩·**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斯 图 加 特

1891 年 2 月 23 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我前天仓促发出的贺信，你大概已经收到了。现在我们还是再来谈谈马克思的信吧。

担心这封信会给敌人提供武器，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恶意的诽谤当然是借任何理由都可以散布的。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惊愕，并使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能给自己奉送这种东西的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呵！这一点，从你寄给我的（多谢！）和我从别处得到的敌人的报纸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老实说，当我准备发表这个文件时，我也想到了这一点。我知道，这个文件最初一定会使某些人感到很不愉快，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文件的内容绰绰有余地补偿了这一点。同时我知道，党已经非常坚强，足以经受得住这件事，而且我认为，党在目前也一定**经受得住**这种在十五年前使用过的直率的语言，以后将可以怀着应有的自豪心情提到这次力量的检验，并且说：哪里还有另外一个政党敢于这样做呢？其实，这句话已经由萨克森的《工人报》、维也纳的《工人报》以及《苏黎世邮报》[50]说了。

你在《新时代》[37] 第 21 期上承担起发表的责任[51]，对你来说，这是很值得称赞的，但是不要忘记，第一个推动力毕竟是我给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使你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我要承担主要的责任。至于细节，那末在这方面总是会有不同意见的。你和狄茨所反对的每一个地方，我都已经删去和修改了，即使狄茨标出更多的地方，我也会尽可能地考虑；我一向用事实向你们证明我是好商量的。但是，至于说到主要之点，那末**我的责任**就是：纲领一提出讨论，就发表这份手稿。而且，李卜克内西在哈雷做了报告[39]——这个报告一部分是他从马克思所写的批判中抄录来的并放肆地当做自己的加以利用；一部分是不指名地针对这份手稿进行论战，——马克思如果还在世的话，一定会拿自己的原稿来对这种篡改表示异议，而我是有义务替他做这件事的。可惜，那时我手头还没有这个文件；我只是在找了很久以后才找到的。

你说，倍倍尔写信告诉你，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态度激起了老拉萨尔分子的恼怒。这是很可能的。这些人并不知道事实经过，在这方面倒是值得启发他们一下。拉萨尔的整个伟大名声是由于多年来马克思容忍他把马克思的科学研究成果据为己有并用来装扮自己，而且他由于缺乏经济学素养，还歪曲了这些成果，如果这些人不了解这一点，那并不是我的过错。但是，我是马克思的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所以我有一定的义务。

拉萨尔属于历史已有二十六年了。如果他在非常法[41]

时期没有受到历史的批判，那末现在终于到了必须进行这种批判并弄清拉萨尔同马克思相比究竟应占什么地位的时候了。要知道，掩饰拉萨尔的真实面目并把他捧上天的那种神话，绝不能成为党的信念的象征。无论把拉萨尔对运动的功绩评价得多么高，他在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同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形影不离的是蛊惑家拉萨尔。透过鼓动者和组织者的拉萨尔，到处显露出一个办理过哈茨费尔特诉讼案[52]的律师面孔：在手法上还是那样无耻，还是那样极力把一些面目不清和卖身求荣的人拉在自己周围，并把他们当做单纯的工具加以使用，然后一脚踢开。1862年前，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波拿巴主义倾向的、典型普鲁士式的庸俗民主主义者(我刚才看了他写给马克思的那些信)，由于纯粹个人的原因，他突然改变了方针并开始了他的鼓动工作。过了还不到两年，他就开始要求工人站到王权方面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性格和他相近的俾斯麦勾结在一起，如果他不是侥幸恰在那时被打死，那就一定会在实际上背叛运动。在拉萨尔的鼓动小册子中，从马克思那里搬来的正确的东西和他自己的并且通常是错误的议论混在一起，二者几乎不可能区分开来。由于马克思的评价而感到自己受到挫伤的那一部分工人，只是从拉萨尔两年的鼓动工作来了解拉萨尔，而且还是通过玫瑰色眼镜来看他的鼓动的。但是在这种偏见面前，历史的批判是不能永远保持毕恭毕敬的姿态的。我的责任就是最终一劳永逸地揭示出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真正关系。

这已经做了，我暂时可以因此而感到满足。况且我现在正忙于别的事情。而已经发表的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无情判断，自然会产生应有的影响并赋予别人以勇气。但是，假若情况迫使我非讲话不可，我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只有一劳永逸地肃清有关拉萨尔的神话了。

在国会党团里有人要求对《新时代》进行检查，这确实太妙了。这是非常法时期国会党团独裁（这个独裁当时是必要的而且实行得很好）的幽灵出现了呢，还是对冯·施韦泽过去的严密组织的留恋呢？在德国社会主义科学摆脱了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又要把它置于一个由社会民主党的机关自己炮制和实施的新的反社会党人法之下，这实在是个绝妙的想法。但是，大自然本身总不会叫树木长得戳破了天。

《前进报》上的那篇文章[47]很少能触动我。我将等待李卜克内西按自己的看法叙述事情的全部经过以后，再用尽可能友好的语调一并予以答复。将在《前进报》上发表的文章只要纠正几个不对的说法（例如，好象是我们不愿意合并，事实似乎证明了马克思的不正确等等），并肯定那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就行了。如果不再发生新的攻击或出现错误的论断，迫使我进一步采取行动，我想，在我这方面就以这个答复来结束现在这场争论。

请告诉狄茨，我正在整理《起源》[53]。可是今天又收到了费舍的信，他也要我写三篇新的序言[54]！

你的　**弗·恩·**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1年3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你2月19日的来信收到了。在这期间，关于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对于在《新时代》[37]上发表马克思关于纲领的信深为不满一事，你大概已经听到很多了。这个文件所引起的波动至今尚未平息。我暂且让这些人出出丑，而在这方面，李卜克内西在《前进报》[40]上也卓有成效。到时候，我当然要答复他们，但避免不必要的谩骂词句，不过没有一点儿讽刺也未必能行。自然，所有在理论方面值得重视的人都站在我这一边——只有倍倍尔除外，他确实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地感到我挫伤了他，但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已经整整一个月因为忙于工作没有看《人民报》[55]了，所以不知道这场风暴在美国有否反应。在欧洲，拉萨尔派的残余大发雷霆，这些人在你们那里也够多的了。

……

你的　**弗·恩·**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　林

1891年5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今天答复你3月30日和4月25日的两封来信[56]。欣悉你们美满地度过了银婚，并产生了对未来欢庆金婚的憧憬。衷心预祝你们俩如愿以偿。在我——用德骚老人的话来讲——被魔鬼抓走之后，我们还长久地需要你。

我不得不再一次——但愿是最后一次——谈谈马克思的纲领批判。“对发表纲领批判这件事本身，**谁也**不会反对”——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李卜克内西**永远**也不会甘心情愿地同意发表，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1875年以来，这个批判对他一直是如鲠在喉，只要一提到《纲领》，他就想起这个批判。他在哈雷的讲话[39]通篇都是围绕着这个批判的。他在《前进报》上发表的那篇华而不实的文章[47]，只不过表明他对这个批判心怀鬼胎。的确，这个批判首先是针对他的。根据这个合并纲领的**腐朽的**特点，我们过去认为他是该纲领的炮制者，而且我至今还这样认为。正是这一点使我毅然采取单独行动。如果我能只同你一人讨论这个文件，然后立即把它寄给卡尔·考茨基发表，我们两小

时就能谈妥。但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从个人关系和党的关系来说，你也必须征求李卜克内西的意见。而这会引起什么后果，我也是清楚的。或者是文件不能发表，或者，如果我仍然把它发表的话，那就要发生公开争吵，至少是在一个时期内，而且和你也要争吵。我并没有说错，下述一点可以证明：你是4月1日出狱的，而文件上所注的日期是5月5日，所以，如果没有其他的解释，那显然是**有意**向你**隐瞒了**这个文件，而这**只能是李卜克内西**干的。但是，你为了和睦相处竟允许他散布谣言，说你因为坐牢而没有看到这个文件。同样，为了避免在执行委员会发生争执，这个文件发表以前，看来你也得考虑李卜克内西的意见。我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希望你也注意到，我考虑了事情可能发生的变化。

我刚才又把这篇东西读了一遍。也许再删去一些也无碍大体。但可删的肯定**不多**。当时的情况怎样呢？草案一经你们的全权代表通过，**事情就已成定局**，对这一点，我们了解得并不比你们差，也不比譬如我查到的1875年3月9日《法兰克福报》[24]所了解的差。因此，马克思写这个批判只是为了拯救良心，丝毫不指望有什么效果，正如结尾的一句话所说的：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所以，李卜克内西大肆宣扬的“绝对不行”只不过是夸口而已，这一点他本人也很清楚。既然你们在推选你们的代表时疏忽大意了，继而为了不损害整个合并事业又只得吞下这个纲领，那末你们确实也不能反对在**十五年后**的今天把你们

在最后决定以前得到的警告公诸于众。这样做，既不会使你们成为蠢人，也不会使你们成为骗子，除非你们奢望你们的正式言行绝对不犯错误。

诚然，你没有读过这一警告。而且报刊也谈到过这一点，因此，比起读过这个警告而仍然同意接受该草案的那些人，你的处境就非常有利。

我认为附信十分重要，信中阐述了唯一正确的政策。在一定的试行期间采取共同行动，这是唯一能使你们避免拿原则做交易的办法。但是李卜克内西无论如何不想放弃促成合并的荣誉，令人诧异的只是，他那时候没有做出更大的让步。他早就从资产阶级民主派那里接受了地地道道的合并狂，并且一直抱住不放。

拉萨尔分子所以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党已全部瓦解，是因为他们的首领都是些无赖或蠢驴，群众不愿意再跟他们走了，——所有这一切今天都可以用适当的缓和的形式讲出来。他们的“严密组织”已自然而然地彻底崩溃。因此，李卜克内西以拉萨尔分子牺牲了他们的严密组织为理由——事实上他们已没有什么可牺牲的了——来替自己全盘接受拉萨尔信条进行辩解，这是很可笑的！

纲领中这些含糊和混乱的词句是从哪里来的，你感到奇怪。其实，所有这些词句正是李卜克内西的化身。为此，我们跟他已争论了多年，他对这些词句非常欣赏。他在理论问题上从来是含糊不清的，而我们的尖锐措词直到今天

还使他感到恐惧。可是，他作为人民党的前党员，至今仍然喜欢那些包罗万象而又空洞无物的响亮词句。过去，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由于不善于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措词含糊地把工人**阶级**的解放说成“劳动的解放”，甚至国际的文件有些地方也不得不使用文件对象的语言，这就成了李卜克内西强使德国党沿用陈旧用语的充足根据。绝对不能说他这是“违背自己的见解”，因为他确实也没有更多的见解，而且他现在是否就不处于这种状态，我也没有把握。总之，他至今还常常使用那些陈旧的含糊不清的术语，——自然，这种术语用来夸夸其谈倒是方便得多。由于他确认他自以为十分通晓的基本民主要求至少象他不完全懂得的经济学原理同样重要，所以，他的确真诚地相信：他同意接受拉萨尔信条，以换取基本民主要求，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至于谈到对拉萨尔的攻击，我已经说过，对我来说这也是极为重要的。由于接受了拉萨尔经济学的**全部**基本用语和要求，爱森纳赫派**事实上已成了拉萨尔派**，至少从他们的纲领来看是如此。拉萨尔派所能够保留的东西一点也没有牺牲，的确一点也没有牺牲。为了使他们获得圆满的胜利，你们采用了奥多尔夫先生用来赞扬拉萨尔的歌功颂德的押韵词句[57]做你们的党歌。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的十三年内，在党内反对对拉萨尔的迷信当然没有任何可能。但是这种状况必须结束，而我已经着手进行。我再也不容许**靠损害马克思**来维持和重新宣扬拉萨尔的虚假声誉。同拉萨尔有

过个人交往并崇拜他的人已经寥寥无几，而所有其他的人对拉萨尔的迷信**纯系人为的**，是由于我们违背自己的信念对它采取沉默和容忍的态度造成的。因此，这种迷信甚至也不能以个人感情来解释。既然手稿是发表在《**新时代**》[37]上，也就充分照顾了缺乏经验的和新的党员。但是，我决不能同意：在十五年的耐心等待之后，为了照顾情面和避免党内可能出现的不满而把这些问题上的历史真相掩盖起来。这样做，每次总得要触犯一些善良的人，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他们对此要大发怨言一样。在此以后，如果他们说什么马克思妒嫉拉萨尔，而德国报刊甚至（!!）芝加哥《先驱报》[58]（该报是为在芝加哥的地道的拉萨尔派办的，他们的数目比在整个德国还要多）也都随声附和，这对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还抵不上跳蚤咬一口。他们公开指责我们的岂止这些，而我们还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马克思严厉地谴责了神圣的斐迪南·拉萨尔，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这在目前已经足够了。

再者，你们曾企图强行阻止这篇文章发表，并向《新时代》提出警告：如再发生类似情况，可能就得把《新时代》移交给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管理并进行检查，从那时起，由党掌握你们的全部刊物的措施，不由地使我感到离奇。既然你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那你们和普特卡默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这对我个人来说，倒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我要讲话，任何国家的任何党都不能迫使我沉默。不过，我还是要你们想一想，不要那么器量狭小，在行动上少来点

普鲁士作风，岂不更好？你们——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这样，对种种不愉快的事，只好采取容忍态度，而且最好泰然处之，不要急躁。在德国党和德国社会主义科学之间哪怕是有一点不协调，都是莫大的不幸和耻辱，更不用说分离了。执行委员会和你本人对《新时代》以及所有出版物保持着并且应该保持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你们也应该而且可以以此为满足。《前进报》总是夸耀不可侵犯的辩论自由，但是很少使人感觉到这一点。你们根本想象不到，那种热衷于强制手段的做法，在国外这里给人造成何等奇怪的印象，在这里，毫不客气地向党的最老的领导人追究党内责任（例如伦道夫·邱吉尔勋爵向托利党政府追究责任），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同时，你们不要忘记：一个大党的纪律无论如何不可能象一个小宗派那样严厉，而且使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合在一起（在李卜克内西看来，这却是他那个了不起的纲领促成的！）并使他们如此紧密联合起来的反社会党人法，如今已不复存在了。

……

弗·恩·

附　　录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

（1869 年在爱森纳赫通过）

I. 社会民主工党争取建立自由的人民国家。

II. 社会民主工党的每一成员必须竭力实现如下各项原则：

1. 现今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是极不合理的，因而必须最坚决地反对。

2. 为劳动阶级的解放而斗争不是为阶级特权和优先权而斗争，而是为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为消灭一切阶级统治而斗争。

3. 工人对资本家的经济依附性构成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因此，社会民主工党在通过合作劳动消灭现今的生产方式（工资制度）的条件下，争取使每个工人获得充分的劳动收入。

4. 政治自由是劳动阶级经济解放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社会问题同政治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前者的解决取决于后者，而且只有在民主国家中才有可能。

5. 鉴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只有当工人阶

级共同地和统一地进行斗争的时候才是可能的，社会民主工党承认自己是统一的组织，但是它也使每一单个的成员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来为整体的利益服务。

6. 鉴于工人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任务，也不是一个国家的任务，而是涉及一切具有现代社会的国家的社会任务，社会民主工党认为自己是——在结社法允许的限度内——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分支，并拥护它的一切努力。

III. 社会民主工党主张把下列各点作为鼓动工作中的最近要求：

1. 凡年满二十岁的男子在国会、各该邦的议会、省和区的代表机构以及其他一切代表机关的选举中，都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当选的代表应给以足够维持生活的薪俸。

2. 实行人民的直接立法制度（即提出和否决议案的权利）。

3. 废除等级、财产、出身和信仰的一切特权。

4. 以人民军队代替常备军。

5. 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

6. 实行国民小学的义务教育，以及一切公立教育机构的免费教育。

7. 保证法庭的独立性，建立陪审法庭和专业法庭，实行正式的和口头的诉讼手续，实行免费诉讼。

8. 废除一切出版、集会和结社的法律；实行正常劳动日制度；限制妇女劳动，禁止儿童劳动。

9. 取消一切间接税，实行单一的直接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

10. 要求对合作社事业提供国家支援，对在民主保障下的自由的生产合作社给以国家信贷。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

（1875年在哥达通过）

一、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普遍有益的劳动只有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全部劳动产品属于社会，即在普遍履行劳动义务的条件下，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的一切成员，按照每个人的合理需要属于每个人。

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

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在用于公益目的的条件下对总劳动实行集体调节，公平分配劳动所得。

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来说，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

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从这些原则出发，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通过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来粉碎铁的工资规律，废除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虽然首先是在民族范围内进行活动的，但是它意识到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并决心履行工人

所承担的一切义务，以便使一切人的兄弟联合成为现实。

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无论在工业中，或是在农业中，生产合作社都必须普遍建立起来，以便从它们里面产生出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要求把下列各项作为国家的基础：

1. 凡年满二十岁的国民在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选举和投票中都享有秘密投票和义务投票的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和投票权。选举日或投票日必须定在星期日或节日。

2. 实行人民的直接立法制度。由人民决定宣战与媾和的问题。

3. 实行普遍军事训练。以人民军队代替常备军。

4. 废除一切特别法律，尤其是关于出版、结社和集会的法律；废除限制自由发表意见、自由探讨和自由思想的一切法律。

5. 实行人民裁判。实行免费诉讼。

6. 通过国家实行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在一切学校实施免费教育。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现代社会内部提出下列要求：

1. 本着上述要求的精神尽可能扩大政治上的权利和自由。

2. 向国家和地方缴纳单一的累进所得税，取消一切现行的、特别是加重人民负担的间接税。

3. 保证无限的集会结社的权利。

4. 实行同社会需要相适合的正常劳动日。禁止星期日劳动。

5. 禁止童工和一切有害于健康和道德的妇女劳动。

6. 实行保护工人生命和健康的法律。监督工人住宅的卫生状况。通过工人选出的人员对矿山、工厂工业、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监督。实施有效的雇主责任法。

7. 调整监狱劳动。

8. 工人的互助基金和救济基金完全由工人自己管理。

注　　释

1 卡·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是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的发展的重大贡献，是对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典范，于1875年4—5月初写成，并于1875年5月5日寄给了爱森纳赫派的领导（给威·白拉克）。这一著作包含了对将要合并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的批评意见，这些意见是为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而准备的。

《哥达纲领批判》是恩格斯于1891年不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的反对而首先发表的。它当时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新时代》杂志1891年第1卷第18期上，并附有恩格斯的序言。

恩格斯在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同时，也一起发表了直接同它有关的马克思在1875年5月5日给威·白拉克的信。

正如大家从恩格斯1891年2月23日给卡·考茨基的信中所知道的，在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时，恩格斯不得不同意缓和某些最尖锐的地方。收集在本书中的这一文件是同马克思的手稿完全一致的。——第1页。

2 在哥达代表大会上（1875年5月22—27日），德国当时存在的两个工人组织——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于1869年在爱森纳赫建立的并由他们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所谓爱森纳赫派），和由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和特耳克领导的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成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第3页。

3 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在反社会党人法取消后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0年10月16日根据哥达纲领主要起草人威廉·李卜克内西的提议，决定起草一个新纲领草案，提交下届党代表大会讨论。这个新纲领于1891年10月被通过（《爱尔福特纲领》）。——第3页。

4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是于1872年9月在同巴枯宁作斗争的标志下举行的。代表大会的多数拥护马克思领导的总委员会的立场。巴枯宁被开

除出国际。——第4页。

5 指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1873年苏黎世版。——第5页。

6 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

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这支左翼赞同人民党通过民主的途径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统一问题的意图，后来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它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后，于1869年8月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第5、27、36、55页。

7 指由马克思亲自校订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译本，这一译本于1872—1875年在巴黎分册出版。——第6页。

8 《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社会民主工党的出版社，它附属于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第7页。

9 指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第二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它是由《人民国家报》出版社于1875年在莱比锡出版的。——第7页。

1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76页。——第19页。

11 指1874年1月10日的帝国国会选举。——第19页。

12 马克思在这里大概是把《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哈赛尔曼讽刺地称为马拉。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 Social-Demokrat»*）是从1871年至1876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的德文报纸，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的方针完全反映了拉萨尔派所执行的迎合俾斯麦制度和巴结德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反映了拉萨尔派领袖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该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一贯反对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分子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人们所进行的仇视总委员会的活动。——第20页。

13 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1867年在瑞士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1867—1868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工作。在活动的初期，同盟企图利用工人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声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以此在群众中散布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第20、27页。

14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在1871—1872年，俾斯麦企图同奥地利和俄国签订一个正式协定，目的是要共同迫害革命运动，特别是第一国际。1873年10月，根据俾斯麦的倡议，缔结了所谓三国同盟，即德国、俄国和奥匈帝国三国政府之间就一旦发生“欧洲动荡”采取共同行动的协定。——第21页。

15 马克思指的是1875年3月20日《北德总汇报》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发表的一篇社论；文章同时指出，“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在某些方面变得比较谨慎了：它在背弃国际”。

《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是反动的日报，在六十至八十年代是俾斯麦政府的机关报；1861年至1918年在柏林出版。——第21页。

16 拉萨尔对他的“**铁的工资规律**”作了如下的表述：“这个在现今的关系之下，**在劳动的供求的支配之下**，决定着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是这样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

这是这样的一个中心点：实际日工资总是在它周围摆动，既不能长久地高于它，也不能长久地低于它。实际的日工资不能长期地高于这个平均数；因为，否则就会由于工人状况的改善而发生工人人口从而人手供应的增加，结果又会把工资压低到原来的或者低于原来的水平。

工资也不可能长期地大大低于这个必要的生活水平。因为，那时就会发生人口外流、独身生活、节制生育，以至最后由于贫困而造成工人人数减少等现象，这样，就会使工人人手的供应短缺，从而使工资重新回到它原来的较高的水平。因此，实际的平均工资处于运动之中，始终围绕着它这个重心上下摆动，时而高些，时而低些。”（见《工人读本，拉萨尔1863

年5月17和19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演讲》，1887年霍廷根—苏黎世版）

拉萨尔最初是在《就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年苏黎世版第15—16页）中论述这个“规律”的。——第22、38、48、52页。

17 指弗·阿·朗格在其著作《工人问题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1865年杜伊斯堡版第144—161、180页（«Die Arbeiterfrag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Gegenwart und Zukunft». Duisburg, 1865, S. 144—161, 180）上所发表的言论。——第22页。

18 《工场》（«L'Atelier»）是一种法文月刊，受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手工业者和工人的刊物，1840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编辑部由工人代表组成，每三月改选一次。——第25页。

19 人们把爱森纳赫派称为“诚实的人”。——第28、36页。

20 “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取的一套法律措施所起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天主教，反对支持德国西南部中小各邦的官吏、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分裂主义和反普鲁士倾向的“中央”党。在八十年代，俾斯麦为了纠集反动力量把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取消了。——第30页。

21 这是弗·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写给奥·倍倍尔的信，就内容来说，它同卡·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有密切的联系，并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的两个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原定于1875年年初实行的合并所持的共同意见。1875年3月7日《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未来的合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草案，这是写信的直接原因。这个草案包含一整套反科学的荒谬论点和对拉萨尔派的让步，只是略加修改就于1875年5月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上通过了，后来以哥达纲领的名称闻名。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两个工人党的合并也抱肯定态度，但是他们认为，必须在原则上健康的基础上，在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不向已经在工人群众中失去自己影响的拉萨尔派让步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合并。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爱森纳赫派的指导性信件）中批

评了哥达纲领草案，并警告爱森纳赫派不要向拉萨尔派让步。只是过了三十六年，这封信才第一次发表在1911年斯图加特出版的倍倍尔《我的一生》一书的第2卷中（«Aus meinem Leben», Teil 2, Stuttgart, 1911）。——第35页。

22 指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全德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在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后来大家熟悉的爱森纳赫党。爱森纳赫纲领总的来说保持了国际的各项要求的精神。见本书第73—75页。——第36页。

23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从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由威·李卜克内西掌握。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第36、44页。

24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法兰克福报和商报》(«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的简称，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从1856年至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66年起用这个名称）。——第36、46、50、57、68页。

25 指的是哥达纲领草案的下列各项：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自由的基础：

1.凡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在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选举中都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2.实行人民有权提出和否决议案的直接的立法；3.实行普遍军事训练，以人民军队代替常备军，由人民代表机关决定宣战与媾和的问题；4.废除一切特别法律，尤其是关于出版、结社和集会的法律；5.建立人民法庭，实行免费诉讼。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

1.通过国家来实施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2.科学自由。信仰自由。”——第37页。

26 即和平和自由同盟。见注 13。——第 37 页。

27 见注 16。——第 38 页。

28 见《资本论》第 1 卷第 7 篇。——第 38 页。

29 恩格斯指的是威·白拉克的小册子《拉萨尔的建议》1873 年不伦瑞克版(«Der Lassalle'sche Vorschlag». Braunschweig, 1873)。——第 38 页。

30 指《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71—198 页)。——第 40 页。

31 恩格斯指的是巴枯宁在他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导言中所说的话,该书第一卷于 1873 年在瑞士出版。马克思在自己作的巴枯宁这本书的摘要中揭露了巴枯宁提出的责难是毫无根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655—708 页)。

《民主周报》(«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是德国工人的报纸;该报用这个名称从 1868 年 1 月至 1869 年 9 月在莱比锡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主编。从 1868 年 12 月起,该报成为奥·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机关报。最初该报受到人民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久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该报开始同拉萨尔派进行斗争,宣传国际的思想,刊登国际的重要文件,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869 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宣布该报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并改名为《人民国家报》(见注 23)。——第 41 页。

32 在哥达代表大会上,由两个合并的组织的代表组成了党的领导机构。委员会由拉萨尔派的哈森克莱维尔、哈特曼、德罗西和爱森纳赫派的盖布、奥艾尔组成。——第 44 页。

33 公元前 321 年,在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中击败了罗马军团,并强迫他们通过"轭形门",这对战败的军队来说是最大的耻辱。从此便有了"通过卡夫丁轭形门"的说法,意即遭到莫大的侮辱。——第 45、49 页。

34 指委员会建议从党的文献目录中删除下列批判拉萨尔的几本著作:伯恩哈特·贝克尔的《斐迪南·拉萨尔悲剧性死亡的真相》,1868 年什莱茨版;《拉萨尔在工人中进行鼓动的历史》,1874 年不伦瑞克版;威廉·白拉克的《拉萨尔的建议》,1873 年不伦瑞克版。——第 45 页。

35 下届帝国国会选举于1877年1月10日举行。——第46、48页。

36 恩格斯所说的“莱比锡人”，指的是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以及《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其他成员。——第47页。

37 《新时代》(«Die Neue Zeit»)——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917年以前，考茨基担任编辑。1885—1895年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恩格斯经常给编辑部以指示，对于它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表现，也给以激烈的批评。——第52、54、60、63、66、71页。

38 恩格斯指的是他不久以后发表的著作《布伦坦诺反对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1891年汉堡版。——第52页。

39 指威廉·李卜克内西于1890年10月15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做的关于党纲的报告(参见注3)。——第53、63、67页。

40 《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于1891年1月31日和1891年2月1日和3日先后在《新时代》杂志第18期和《前进报》上发表。

《前进报》(«Vorwärts»)——1876—1878年在莱比锡出版，1891—1933年在柏林出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1876—1878年由李卜克内西和哈森克莱维尔领导；1891—1900年由李卜克内西单独领导。——第54、58、66页。

41 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阻扰《新时代》杂志第18期发行一事，该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

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的**反社会党人法**，是俾斯麦政府为了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实施的。其效力每2—3年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废除。——第54、59、63页。

42 《汉堡回声报》(«Hamburger Echo»)——从1887年起在汉堡出版；社会民主党的日报。——第57页。

43 《关于对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批判》(«Zur Kritik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rogramms»)这篇社论(载于1891年2月8日《汉堡回声报》第33号)，指出了恩格斯发表的马克思这封关于纲领的信件对制定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纲领的重要意义。

恩格斯谈到**既得权利体系**，是指1861年在莱比锡出版的拉萨尔那本

同名著作中阐述的“既得权利体系”；拉萨尔按照他的唯心主义观点，从哲学和法学的角度阐述了人与人之间的法的关系。——第57页。

44 据来自柏林的一则通讯（载于1891年2月6日维也纳《工人报》第6号）报道，恩格斯在德国发表了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文件——马克思对1875年哥达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德国党纲领的《批判》。通讯的作者指出了恩格斯的功绩，他写道：恩格斯“正是在现在，正是在需要十分明解地、毫不妥协地确定我们党的理论基础的时刻，把这一《批判》公诸于世”。——第57、60页。

45 这里提到的保·拉法格为《新时代》写的那篇文章，没有在该刊发表。它发表在1892年《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第16卷第93期，题为：《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La théorie de la Valeur et de la plus-value de Marx et les économistes bourgeois»)。——第58页。

46 茹·盖得在他的通讯《法国来信》(«Briefe aus Frankreich»)（载于1891年1月28、30日《前进报》第23、25号）中，揭露了以孔斯旦、鲁维埃等人为首的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所谓的“机会主义派”）损害共和国声誉的、镇压国内工人运动的政策。——第58页。

47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于1891年2月13日在一篇编辑部专论《马克思关于纲领的一封信》(«Der Marx'sche Programm-Brief»)中表明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对《哥达纲领批判》的正式态度。该文激烈反对马克思对拉萨尔的评价，用“绝对不行”来同马克思这样的权威的建议相对抗，并且赞成党不顾马克思的批评而通过纲领草案的行动。——第58、60、65、67页。

48 1890年11月27日至12月初，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和保·辛格尔曾到恩格斯家里作客；他们到伦敦，是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祝贺恩格斯七十寿辰（1890年11月28日）。根据恩格斯的倡议，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会见了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们爱·马克思-艾威林、约·白恩士、威·梭恩和肯宁安-格莱安，就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问题，特别是就加强各社会主义和工人的政党和团体之间国际联系的方式问题，交换了意见。——第59页。

49 《工人报》(«Arbeiter-Zeitung»)——维克多·阿德勒于1889年在维也纳

创办；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第60页。

50 《萨克森工人报》(«Sächsische Arbeiter-Zeitung») 从1890年起在德累斯顿出版；社会民主党的周刊；后来改为日报。

《苏黎世邮报》(«Züricher Post»)——1890年12月—1891年4月在苏黎世出版；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第62页。

51 《新时代》(1890—1891年第1卷第21期)转载了1891年2月13日《前进报》第37号的社论(见注47)，杂志编辑部除写了引言外，还加了下列说明："我们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把马克思的这封信提交社会民主党党团讨论。只有我们才负有把它公诸于世的责任。"——第63页。

52 指的是1845—1854年拉萨尔以律师身分办理的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案。——第64页。

53 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1891年第4版的准备工作。——第65页。

54 在1891年2月20日的信中，理·费舍把党的执行委员会关于再版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雇佣劳动与资本》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的决定通知恩格斯，并请他写序言。——第65页。

55 《纽约人民报》(«New-Yorker Volkszeitung»)——从1878年起在纽约出版；是由左尔格创办和领导的。——第66页。

56 在1891年3月30日的信中，奥·倍倍尔说明了他长期以来保持沉默的原因，他写道：在马克思关于纲领的那封信发表后，他不愿直接答复，因为不同意该信发表的方式；其次，他在议会活动方面又有很多工作。倍倍尔认为，发表马克思1875年5月5日致白拉克的附函是不妥当的；据他看来，附函所涉及的不是党的纲领，而是党的领导。他不同意发表的理由主要是：这样会向敌人提供反对社会党人的武器，而对拉萨尔的尖锐批判又会触动目前在党内的那些过去的拉萨尔分子。

在1891年4月25日的信中，倍倍尔向恩格斯介绍了德国工人运动的状况，特别是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矿区矿工的罢工情况。他认为这次罢工是不合时宜的，因为这次罢工对那些已在寻找借口压制工人不满的矿主们是有利的。面对可能发生的警方的挑衅（五一节前夕更是一触即发)，党的执行委员会警告矿工们不要过早行动。——第67页。

57 这里指的是1876年11月4日奥多尔夫为纪念斐迪南·拉萨尔的忌辰而写的序诗。——第70页。

58 《先驱报》(«Der Vorbote»)——从1881年起在芝加哥出版；无政府主义的德文报纸。——第71页。